

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重要著作。他全面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详尽分析了俄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生动具体地勾画了市场经济在俄国孕育发展的历程,揭示了市场经济早期的发展规律。本卷选收了这部著作的第一章、第八章和第二版序言。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阐明了关于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及其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和条件等一系列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指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行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列宁还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作了阐述,指出资本主义既有进步的历史作用,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同时又造成了最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因而必然具有历史暂时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出版后,遭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斯克沃尔佐夫的攻击。列宁写了《非批判的批判》一文,驳斥了他的攻击,并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集结在伯恩斯坦周围的那些修正主义者的错误,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始终想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各国的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后者则想抛弃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重要方面。

为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政治鼓动工作,列宁在1895年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这个协会的影响下,俄国各地相继成立类似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彼此缺乏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党。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一方面继续批判民粹

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粗略比较	594
12. 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599
13. 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608
补充说明 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618
一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618
二 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	625
三 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	633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9月1日[14日])	644—652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1905年10月25日[11月7日])	653—661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11月13日[26日])	662—667
军队和革命(1905年11月15日[28日])	668—671
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12月9日和15日])	672—679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1906年8月29日[9月11日])	680—687
游击战争(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688—698
*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5日[18日])	699—708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4月6日[19日])	709—728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720

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

十分明确)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思想关系?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的解释很独特,值得拿来分析一下。他说:“无论我们怎样玩弄子女生产这个术语,以图在它和经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无论它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同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一番子女生产有其生理根源的话,莫非是说给吃奶的孩子听的吗!?您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呢?)而这使我们联想到,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没有弄清楚历史,也没有弄清楚心理学。毫无疑问,氏族联系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但关于直接的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却未必能同样有把握地这样说。固然,它们在整个日益复杂的生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只要有一定的辩证技巧就可以证明: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联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我们正准备研究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举出遗产制度来说一说。”

我们的哲学家终于有幸由说空话^①进而谈到事实了,而这些事实是确定的,可以检验的,是不允许“顾左右而言他”轻易绕过问题实质的。我们且来看看,我们这位批评马克思的批评家是怎样

① 责备唯物主义者没有搞清楚历史,却不试图把唯物主义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作的许多唯物主义说明的任何一种拿来分析一下;或者说:本来是可以证明的,但我们不来研究这一点,——的确,像这样的手法,不是说空话又是什么呢?

想推翻历史是一系列阶级斗争事件这一原理,于是便以深思的神情宣称这是“走极端”,他说“马克思所建立的、以进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阻止住法德两国工人互相残杀和弄得彼此破产”,据他说,这也就证明唯物主义没有清除“民族自负和民族仇恨的邪魔”。这种断语表明,这位批评家丝毫不懂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非常实际的利益是这种仇恨的主要基础,丝毫不懂得把民族感情当做独立因素来谈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不过,我们已经看出,我们的哲学家对民族有多么深奥的认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会以纯粹布勒宁式的讥讽态度¹³来对待国际¹⁴,说“马克思是那个诚然已经瓦解但一定会复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当然,如果像《俄国财富》杂志第2期国内生活栏编者按小市民的庸俗见解所写的那样,把“公平”交换制度看做国际团结的极限,而不懂得无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交换始终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和内容,不懂得不消灭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就不能停止国际冲突,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一说到国际,就一味嘲笑。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真理:除非在每一个国家把被压迫者阶级组织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办法来消除民族仇恨的。至于说国际没有阻止住工人互相残杀,那只要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醒一下巴黎公社事件就够了,它表现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进行战争的统治阶级的真正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全部论战中,特别令人愤慨的,正是他的手法。如果他不满意国际的策略,如果他不赞成那些使欧洲工人为之而组织起来的思想,那他至少应当直率而公开地批评这些策略和思想,说明他认为什么策略更适当,什么观点更正确。可是

来,批评家查阅了马克思主义者原来的声明,发现他们自己认为只是说明了一个社会形态,于是批评家就断定唯物主义者缩小了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说这样他们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为了向人说明制定这个唯物主义的方法,他便捏造说唯物主义者自己都承认他们的知识不足以制定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承认(在 1845—1846 年)对经济史的知识不够,虽然他们从未刊印这部证明他们知识不够的著作。演了这样一些前奏之后,批评家就以如下的批评款待我们:《资本论》被推翻了,因为它只涉及一个时期,而批评家是需要各个时期的;因为《资本论》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不过是涉及经济唯物主义。这些论据大概很有分量并且很重要,所以只得承认唯物主义从未被科学地论证过。接着又用这样一事实来反驳唯物主义,说有一个与这个学说完全无关的人,完全在另外一个国家研究了史前时期,也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其次,为了表明把子女生产扯到唯物主义上面去是完全不正确的,表明这不过是玩弄字眼,于是批评家就来证明经济关系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这位严肃的批评家在这里为了教训唯物主义者所作的指点,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深刻的真理:遗产制度非有子女生产不行,复杂的心理是同这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的,子女是以父辈的精神来教育的。顺便我们也知道了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批评家在继续他的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钻研时,察觉到马克思主义者许多论据的内容都是说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是“必然”的,这个制度“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连忙宣称:必然性是个太一般的括弧(如果不说清楚人们究竟认为什么是必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批评家还说,马克思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是“单方面的”,可是只字不提这些唯心主

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因为不能否认(值得注意的是连民粹派和民意党也不否认),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它只能……只能改善同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我说这些话是反对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他们不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却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因为他们根据经验确信只有在工人中间才可以找到革命分子。这些社会主义者使自己的理论同实践相抵触,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诱使工人抛弃自己的直接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①

当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因受农奴制度的压制而完全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农奴制度激起了全体知识分子一致的抗议和斗争,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我国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民主主义,以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之间没有深刻分歧的时候,产生上述错误是很自然的。现在,当经济发展已有长足的进步,甚至从前否认俄国有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人也承认我国恰恰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对这一点已经不可能有任何错觉了。“知识分子”的成分,也和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社会成分一样,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果说,在后者中间起统治和支配作用的是资本家,那么,在前者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人数日益迅速增加的一帮野心家和资产阶级的奴仆,也就是那些心满意足、毫无梦想、深知本身要求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激进派和自由派不仅不

① 必须发动工人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结论可以从两方面得出:或者把工人看做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战士,那就得把政治自由看做便利工人斗争的条件之一。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看的。或者把工人单单看做是在现代制度下受苦最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并能最坚决地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但这也就等于要工人做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尾巴,而资产阶级激进派是不愿看见在全体“人民”一致反对专制制度的后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的。

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践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还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思和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¹⁹上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①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⁴³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②。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回国了。他们在莱茵普鲁士主编在科隆出版的民主派的《新莱茵报》⁴⁴。这两位朋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大家知道,当时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56—86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67页。——编者注

一口气,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

载于1896年《工作者》文集
第1—2期合刊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
第1—12页

产”的一般“启蒙”性质表达得相当清楚。像西欧的启蒙者和 60 年代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斯卡尔金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充满着强烈的仇恨。这是“启蒙者”的第一个特征。俄国的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最后，“启蒙者”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农民在启蒙者时代还没有完全解放，或者刚刚得到解放），他们真诚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想要促进这一事业。这三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60 年代遗产”的本质。重要的是要着重指出，在这个遗产里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俄国有不少著作家，就其观点说来，是符合上述特征的，而且与民粹派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要一个著作家的世界观中有上述特征，人们总公认他是“保持了 60 年代传统”的著作家，完全不管他对民粹主义采取什么态度。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要说，例如，不久前才举行过寿辰庆祝会的米·斯塔秀列维奇先生由于反对民粹派或对民粹派提出的问题采取了冷淡态度，便是“拒绝了遗产”。我们所以拿斯卡尔金作例子^①，正因为他毫无疑

①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斯卡尔金在对村社的敌视态度上和声调上都不是 60 年代的典型人物。但是这里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村社。问题在于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而斯卡尔金也赞同的那些观点。至于他的声调，也许的确不是典型的，因为它是稳健的、温和的、渐进的，等等。难怪恩格斯把斯卡尔金叫做温和的保守分子（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3 卷第 398 页脚注。——编者注）。然而如果拿一位具有更典型的声调的遗产代表来考察，那么，第一，由于种种原因这样做会是不方便的，第二，拿他来同现代民粹主义比较，会使人产生误会。⁶³按我们任务的性质说来，声调（与一句谚语说的相反）不构成音乐，而且因为斯卡尔金的声调不典型，所以他的“音乐”，即他的观点的内容，就更加突出。我们感到兴趣的正是这个内容。我们也只打算在观点的内容方面（决不是在作者的声调方面），把遗产代表和现代民粹派分子作一个比较。

就是恩格尔哈特对许多纯粹资产阶级的愿望和措施所采取的那种不自觉的态度。不是说恩格尔哈特力图粉饰小资产者,捏造出某种借口(类似瓦·沃·先生那样)来反对把这种称号应用到某些企业主身上去,——完全不是。恩格尔哈特是一个实践农业主,他只醉心于经济上的各种进步和改良,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改良的社会形式最好不过地推翻了他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在我国不可能发展的理论。例如,我们回忆一下,他如何醉心于在自己的经济中对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揉麻、脱粒等等)而获得的成绩。恩格尔哈特仿佛也没有料想到,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时工资是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采取的最流行的方法之一,资本主义经济用这个方法可以加强劳动强度和增加额外价值⁶⁴额。再举一个例子。恩格尔哈特嘲笑了《农业报》⁶⁵的“停止轮流出租田地,利用雇农劳动组织经济,采用改良的机器、工具、畜种,实行多圃制,改善草地和牧场等等”这一纲领。恩格尔哈特大叫道:“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老生常谈!”(第128页)然而恩格尔哈特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所实行的正是这个纲领,他正是由于利用雇农劳动组织经济才在自己的经济中取得了技术改进。还有,我们看到,恩格尔哈特是多么直率、多么正确地揭露了善于经营的农夫的真正趋向;但这丝毫也没有妨碍他肯定说:“所需要的不是各种工厂,而是小规模(黑体是恩格尔哈特用的)农村酒坊和油坊”以及其他等等(第336页)。这就是说,“所需要的”是使农村资产阶级向技术性农业生产过渡,——这种过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农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征兆之一。这就表明,恩格尔哈特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践农业主。议论不要资本主义也可能进步是一回事,亲自经营是另外一回事。恩格尔哈特既抱定合理组织自己的经济的目的,就为周围环境的力量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纯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把自己关于“雇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农”的一切理论上的抽象的疑问搁在一边。斯卡尔金在理论上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发议论的，他既根本看不见自己议论的这种性质，也根本看不见自己的议论是与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需要相适应的。恩格尔哈特在实践中不得不作为一个典型的曼彻斯特派分子来行动，这与他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他相信祖国将走一条特殊的道路的热望背道而驰。

然而恩格尔哈特确实是这么相信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他叫做民粹派分子。恩格尔哈特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俄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趋向，并且开始否认这个发展的矛盾。他竭力证明农业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能发展，证明“我国没有雇农”（第 556 页），——然而他自己却十分详尽地推翻了我国工人工资很高的说法，他自己表明在他那里做工要养活全家的牧工彼得所领得的工资是多么微薄，除了吃饭以外一年只领得 6 个卢布来“购买油、盐、衣服”（第 10 页）。“即使这样，人家还很羡慕他，我如果不要他，马上就会有 50 个人愿意来顶替。”（第 11 页）恩格尔哈特在指出自己经营的成绩和工人熟练地使用耕犁时扬扬得意地叫喊道：“耕地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愚昧无知、不好好干的俄国农民。”（第 225 页）

恩格尔哈特虽然用自己的经营和自己对农民个人主义的揭露推翻了关于“村社倾向”的一切幻想，但他却不仅“相信”农民可能向劳动组合经济过渡，而且还表示“确信”事情将来一定会这样，我们俄国人正是要完成这个伟大事业，要采用新的经营方法。“我国经济的独特性或独创性就表现在这里。”（第 349 页）现实主义者恩格尔哈特变成了浪漫主义者恩格尔哈特，这个浪漫主义者以对未来的“独特性”的“信心”来补偿自己经营方法中和他所观察到的农民经营方法中完全不存在的“独特性”！从这样的信心

以大谈基石的力量,但是在实践中每个民粹派分子都清楚地感觉到:扫除旧事物的残余,扫除至今还把我国农民从头到脚紧紧束缚住的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正是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给其他什么发展开辟道路。宁肯停滞,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进步,——这实质上就是每个民粹派分子对农村的看法,当然,远不是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像瓦·沃·先生那样天真直率,敢于公开直接地说出这个意思。“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像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像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遗产”代表之一就是从他所特有的“启蒙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⁶⁶“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他们因循守旧的宗法式的生活方式中,也不要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每个民粹派分子实质上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事实上,大概没有一个民粹派分子敢于否认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禁止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是与现代经济现实、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及其发展处于最尖锐的矛盾中。否认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民粹派分子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这样提出问题,害怕这样把农民的法律状况与经济现实、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加以对比。民粹派分子顽固地相信并不存在的、由他们浪漫主义地空想出来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因此他们打算阻止现在这个循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的发展。对农民村社的等级制闭塞状态、连环保、农民有权出卖土地和抛弃份地等问题,民粹派分子不仅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十分担心“基石”(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的基石)的命运;不仅如此,民粹派分子甚至堕落到这样卑鄙的地步,竟对警察禁止农民出卖土地的措施表示欢迎。对这样的民粹派分子可以用恩格尔哈特

的情况。(1895年《俄国财富》杂志第5期)^①与恩格尔哈特一同办杂志的瓦·沃·先生,在一些严肃的经济论文中也同样沉醉于这种理想化,他断言:农民战胜了似乎愿意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但糟糕的是农民给地主耕种土地,所得的报酬是从地主那里“租到”土地,——这就是说,他完全恢复了农奴制度下所采用的那种经营方法。这是民粹派分子对我国农业问题持反动态度的最突出例子。你们在每个民粹派分子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只不过表达得不那么突出罢了。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们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的农民。资本主义的现实(“雇农”)与关于“独立”农民的虚构是对立的,因为虚构建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农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点上,可是却谦虚地闭口不谈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要付出比这些生产资料的成本多一倍的代价;这些生产资料是为工役服务的;这种“独立”农民的生活水平极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把他们算做赤贫者;这种“独立”农民除了绝望的贫穷生活和智力迟钝而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所必然带来的人身依附。

民粹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这个特点与上述两个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只有在社会学问题上缺乏现实主义才能产生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错误性”和“越出轨道”的可能性的学说。民粹主义的这个观点也是与60年代的“遗产”和传统没有丝毫联系的,相反,而是与这些传统正相抵触的。从这个观点自然便产生出民粹派分子对于改革前的俄国生活法规的许多残余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遗产”代表者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为了说明这种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8—24、450—479页。——编者注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

然是民粹派分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追求。

因此，归根到底我们就得出了我们在上面个别场合曾不止一次指出过的结论：**学生们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他们不仅不拒绝遗产，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驳斥那些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顾虑，这些顾虑使民粹派分子在很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拒绝接受启蒙者的欧洲理想。当然，“学生们”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保存遗产，还决不等于局限于遗产，所以“学生们”除了捍卫欧洲主义的一般理想而外，还分析了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并从上述特有的观点出发评价了这个发展。

五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考察一下他对我们关心的问题所作的论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声称这些人（学生们）“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并且坚决拒绝遗产”（上引书第 179 页），而且还宣称“他们〈同各种极不相同的流派的其他人物一起，连阿布拉莫夫先生、沃伦斯基先生、罗扎诺夫先生也在内〉非常凶恶地攻击遗产”（第 180 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讲的是哪一种遗产？是《莫斯科新闻》过去和现在都郑重表示拒绝的 60—70 年代的遗产（第 178 页）。

我们已经表明：如果谈的是现代人所承受的“遗产”，那就要区别**两种遗产**：一种遗产是启蒙者的遗产，是绝对敌视改革前的一切的人的遗产，是拥护欧洲理想和广大群众利益的人的遗产。另

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式的论断、释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并且,阐明了国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以后,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单独存在。剩下的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冠以名称。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 (Rohertrag) 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

总收入是总生产 (Bruttoprodukts oder Rohprodukts) 中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总产品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预定要重新成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脚点上,因而只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看做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5—696页)^①

由此看来,阐明了实现过程,也就弄清了收入问题,解决了阻碍了解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为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②? 为什么由个人消费品构成的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951—952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957页。——编者注

欧俄内河货运量,1881年为89 970万普特;1893年为118 150万普特;1896年为155 300万普特。运费在以上各年为18 650万卢布、25 720万卢布、29 000万卢布。

俄国的商船队在1868年有汽船51艘,装载量为14 300拉斯特^①,又有帆船700艘,装载量为41 800拉斯特,而在1896年则有汽船522艘,装载量为161 600拉斯特^②。

外海各港口商轮航运业的发展如下:在1856—1860年这5年间,出入的船舶数目平均每年为18 901艘,装载量为3 783 000吨;在1886—1890年,平均每年为23 201艘(增加23%),装载量为13 845 000吨(增加266%)。因此,装载量增加 $2\frac{2}{3}$ 倍。在39年间(从1856年到1894年),装载量增加了4.5倍;如果把俄国船舶和外国船舶区别开来,那么俄国船舶数目在这39年间增加了2.4倍(从823艘增加到2 789艘),装载量增加了11.1倍(从112 800吨增加到1 368 000吨),而外国船舶数目增加了16%(从18 284艘增加到21 160艘),装载量增加了4.3倍(从3 448 000吨增加到18 267 000吨)。^③我们指出,出入船舶的装载量在各个年份也有很大的变动(例如,1878年为1 300万吨,1881年为860万吨),根据这种变动部分地可以判断对小工、码头工人等等的需求的变动。资本主义在这里也需要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他们始终需要工作,准备一有召唤就着手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多么的不固定。

① 拉斯特是俄国在20世纪初以前使用的商船容量单位,等于5.663立方米,重量约为两吨——编者注

② 《军事统计汇编》第758页和《财政部年鉴》第1编第363页。《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30页。

③ 《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56页及以下各页。